

喇嘛在场：17 世纪的藏传佛教与东亚政局

祁美琴（人民大学）

17 世纪的欧洲社会，经过宗教与政治变革的洗礼，快速步入民族国家发展的时代，宗教神权政治走下政坛。而此时的东方世界，也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明朝、金（清）、内外蒙古各部、准噶尔、西藏以及郑氏、三藩诸政治集团竞相登场，在这一轮王朝更迭、政权博弈、民族较量中，有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就是喇嘛们的身影。尤其是宗喀巴创立的黄教集团，广泛参与了这一时期东亚政局的塑造过程，为我们探讨宗教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极好的案例。本文以 17 世纪在西藏、蒙古、满清政局中呈现出的高度宗教化的趋势，探讨喇嘛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喇嘛进场的“前因”：格鲁派集团在西藏政治地位的确立

到 13 世纪，西藏已经形成稳固的僧俗一体、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个特殊现象是统治势力的更迭演变为各派宗教势力的转换。从本教与藏传佛教的斗争开始，噶当派、萨迦派到噶举派，从黑帽到红帽的轮回，再到格鲁派的黄帽，演绎了一幅喇嘛王朝的兴衰史。

15 世纪格鲁派的崛起以及活佛转世制度的确立，为政治“宗教化”带来前所未有的稳定效应。“大喇嘛是不死的”的“转世”制度，不仅是西藏封建农奴制依赖喇嘛教的根本原因，也是后期蒙古各氏族部落集团愿意接受喇嘛教的内在原因。北元和明代蒙古时期，蒙古草原陷入恢复“黄金家族”世袭权力的战争与氏族部落割据的泥潭，同样需要一种能够从政治、经济和信仰上给统治集团带来凝聚权威和普遍认同的宗教。1578 年，格鲁派教主索南嘉措来到青海与俺答汗的历史性会见，不仅奠定了达赖喇嘛在黄教中的领袖地位，也奠定了黄教在西藏和蒙古的政教地位。俺达汗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从此成为藏传佛教的最高尊号。所以，格鲁派和达赖喇嘛赢得西藏政教领袖的地位和漠南蒙古引入黄教是同时发生的。

1588 年索南嘉措去世后，黄教内部一致认定俺达汗曾孙为“转世灵童”，即达赖四世云丹嘉措——历代达赖喇嘛中惟一的非藏族，充分反映了当时黄教寺院集团急需来自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也为达赖喇嘛在 17 世纪的登场提供了军事和政治保障。

1602 年，四世达赖云登嘉措进抵拉萨，正是这位蒙古裔的达赖喇嘛的出现，成为随后全体蒙古人信奉黄教和介入西藏政教纷争的诱因。其时，信奉噶举派的辛厦巴家族以日喀则为根据地，占据卫藏，与黄教寺院集团直接对抗，1616 年云登嘉措死于拉萨哲蚌寺，传说他是被辛厦巴家族的彭错南杰派人刺杀的^①，1618 年辛厦巴家族正式建立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1636 年，青海蒙古首领图鲁拜琥（即固始汗）为保护黄教及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喇

^①参考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107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年版。

嘛——五世达赖喇嘛，率众进攻盘踞在青海的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因为他们信奉噶玛噶举派，并试图与第悉藏巴汗联合起来消灭黄教。1639年，固始汗进入川康地区，消灭信奉本教、视黄教为敌的甘孜白利土司，擒杀顿月多吉。1642年，固始汗率兵入藏，灭掉了黄教的最后劲敌第悉藏巴地方政权，藏区大部归于固始汗统治下，黄教在西藏也取得了绝对优势。^①

1642年，格鲁派联合和硕特顾实汗击败藏巴汗后建立了一个由达赖喇嘛领导的全新政权“甘丹颇章”，西藏以及整个藏传佛教世界的历史进入了“黄教执政”时代。以拉萨达赖喇嘛系统活佛为领袖的政教权力体系，将西藏推向了历史上宗教政治的最高峰，使得蒙古和西藏地区“教法”凌驾于“朝政”之上，通过宗教以神圣的方式实现了辖区的秩序化。正如喀尔喀土谢图汗所说：“国中向无佛教，是以愚迷，自我曾祖往谒达赖喇嘛，得蒙优礼，加以瓦察喇赛音汗之号，于是我地佛法，炳如日星。”^②从此整个17世纪，“拉萨教廷”开启了主动参与东亚相关政治集团关系塑造的进程。

二、西藏喇嘛集团对蒙古政局的影响

在17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中，蒙古诸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蒙古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仅其内部的联合和分裂直接导致了蒙古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而且由于各部分别地处内陆中部核心地带，使其深深地参与了明末清初的中原王朝与西藏乃至俄国关系的塑造。而在这一时期蒙古政治变局中，黄教喇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16世纪后半叶，由于漠南蒙古领袖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的会晤，并皈依佛教，扶持宗喀巴创立的黄教，就使其后的蒙古各部首领都以弘扬“大力转轮法王阿勒坦汗，平等治理世俗、经教二政”^③，成为其效法的榜样。甚至于1582年（万历十年）阿勒坦汗过世后，明朝派使者吊唁时，“自大都派其大喇嘛为首诸官员”，“按其汉制不断诵经荐福追善”^④，也显示了浓厚的宗教氛围。而阿勒坦汗遗体于1587年被火化后，《阿勒坦汗传》的作者直接呼其为“呼图克图汗”。^⑤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次年出生于今内蒙古商都县察罕淖尔的阿勒坦汗的曾孙，三年后（1592）被西藏三大寺的高僧确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命名为“云丹嘉措”。1593年正月，漠南蒙古在呼和浩特的大召前举行盛大的祈祷法会，“呼图克图达赖喇嘛之美名遍闻十方时，所有四十万蒙古齐萌信仰之心”，“遵识一切达赖喇嘛之命”^⑥，说明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于黄金家族，对于全体蒙古人尊奉喇嘛教具有里程碑意义。

1602年西藏三大寺派人将云丹嘉措迎至西藏坐床受戒学经。虽然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但云丹嘉措进藏标志着喇嘛教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奠定下来，随着蒙古王公贵族对云丹嘉措的转世——五世达赖喇嘛的护持和尊奉，蒙藏政教关系的塑造已然成型，喇嘛集团对于蒙古政局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会盟

会盟是蒙古社会传统的政治治理方式。凡遇重大问题，通过会盟的方式协商和解决。对17世纪蒙古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各部举行的会盟，如1640年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1686

^① 此段历史也可参见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第206—2013页，民族出版社，1989年。本书的叙述角度与王辅仁、索文清著的《藏族史要》不同，可以对比参考。

^② （清）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乙巳。

^③ 《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第13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 《阿勒坦汗传》，第142页。

^⑤ 《阿勒坦汗传》，第156页。

^⑥ 《阿勒坦汗传》，第167—168页。

年喀尔喀各部举行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1691年，康熙帝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的多伦诺尔会盟。在这些会盟中，喇嘛或是倡导者，或是主持人、或是见证人。

如1640年的会盟，是喀尔喀与卫拉特蒙古诸部首领会集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领地举行的著名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并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参加此次会盟的各部首领共28名，“俱为汗、洪台吉或执政诺颜级的人物，其麾下仍有众多小领主”；齐光认为1640年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是蒙古众领主为构筑新的“大朝”努力，而“达赖喇嘛即是‘喀尔喀—卫拉特大朝’的最高权威者——可汗。叩首（即在会盟开始向达赖喇嘛的替身瓦赤怛喇嘛叩首）意味着蒙古众领主从此以后就要承认并遵从达赖喇嘛在蒙古社会中的世俗权力。”^①这是1640年以后蒙古领主们纷纷前去拉萨朝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接见并授予蒙古领主们封号的原因。

虽然我认为齐光的关于达赖喇嘛具有“蒙古汗王”的地位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他的研究也提示我们，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喇嘛教对蒙古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广泛存在，且深度参与了当时蒙古诸部与藏地、满清、及俄蒙等东亚各方政治集团的角逐和关系塑造。

而1686年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是达赖喇嘛和清朝促成的喀尔喀札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等左右翼王公为解决争端的会盟，但因会盟中因为代表土谢图汗一方的哲布尊丹巴对达赖喇嘛代表噶尔厦席勒图的“失礼”，成为其后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的重要诱因。1691年，康熙帝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的多伦诺尔会盟，则是哲布尊丹巴做出的选择。在喀尔喀“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当众王公讨论是北上投靠沙俄还是南下投靠清朝的时候，哲布尊丹巴说：“若因避兵投入俄罗斯，而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视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携全部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②喀尔喀遂归附清朝，多伦会盟标志着内外蒙古全部纳入清朝的版图。

（二）授官号

石滨裕美子认为：“达赖喇嘛的汗号授予，存有巨大的影响力”。^③达赖喇嘛授予蒙古首领官号众多，最有影响如1637年授予青海和硕特、卫拉特盟主图鲁拜琥“顾实汗”称号；1678年授予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这些封号的获得成为蒙古各部王公身份和地位确立“合法化”的途径。

（三）政务处理

如果说，三世达赖喇嘛对蒙古的影响主要在于阿勒坦汗等蒙古首领的信仰改宗，从四世达赖喇嘛开始，对蒙古政局的影响已经显著增加了。就在四世达赖喇嘛准备启程赴西藏学经之时，“右翼三万户与左翼三万户多控马于桩，两大国之政局又将动摇，于是胜师达赖喇嘛亲自召集六万户于欢乐召释迦牟尼之前。以等慈悲之心降不坏金刚般之旨，以巧妙之法使彼等六万户归于和好亲善，整治先祖所建政教之制，立即致大国之政于平安。”^④

1640年以后，即在17世纪后半叶，“五世达赖喇嘛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一直在担当可汗”，卫拉特、喀尔喀各汗王在牧地分配、官位继承等重要政务上，均有奉达赖喇嘛指令的证据。如喀尔喀官位继承上的程序是：“当事人首先向达赖喇嘛反映情况——达赖喇嘛给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土谢图汗等首领下达旨令——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土谢图汗等首领受命召集众领主，

^①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第26-38页。“某些先行研究因没有认清17世纪，尤其是1640年以后达赖喇嘛在蒙古社会中的这种可汗身份，也因缺少对蒙古传统政权构造的足够理解，故而曲解了‘政法与教法二道理论’的含义。”

^② 松筠《绥服纪略》。

^③ 《チベット佛教世界的历史研究》（藏传佛教世界的历史研究）第126页。转引自齐光《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第27页。

^④ 《阿勒坦汗传》，第172-173页。

册封当事人，给以官职”的顺序进行的。^①

达赖喇嘛参处理蒙古政务的事例，如 1671 年，青海和硕特部众台吉向清朝官员答复，没有达赖喇嘛的旨令，拒不从大草滩迁出。1672 年，青海和硕特部达赖汗，向康熙皇帝通告达赖喇嘛颁旨让其即汗位事。1678 年，达赖喇嘛颁旨，令七旗喀尔喀首领，准予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即汗王位。1682 年，达赖喇嘛颁旨，令和硕特部罗卜藏袞布阿拉布坦率领旧部，迁移至阿拉善地方居住。1682 年，达赖喇嘛颁旨，令哲布尊丹巴及喀尔喀众首领，关照昆都仑楚库尔诺颜，将其任命为执政诺颜。1683 年，达赖喇嘛颁旨，要求七旗尊重札萨克图汗，返还其逃入左翼之属民，并授‘札萨克图车臣汗’封号。1685 年，达赖喇嘛令喀尔喀蒙古巴苏特众诺颜与札萨克图汗等一同会盟，解决领地问题。1686 年，达赖喇嘛颁旨，令喀尔喀蒙古将从前的左翼额勒济根诺颜改为右翼；并颁旨哲布尊丹巴，关于蒙古喀尔喀左右翼争端，按照蒙古自古以来的大好礼法，要求其和好。1687 年，达赖喇嘛颁旨喀尔喀蒙古，称札萨克图汗过世后车臣阿海属部人畜损失巨大，让土谢图汗给予返还。^②

三、喇嘛教对清朝政局的影响

（一）重视与拉萨黄教集团建立联系

这里将《清实录》中有关达赖喇嘛与清廷联系的记载，列表如下：

顺治年间与达赖、班禅等高僧喇嘛的互动

	时间	事由	喇嘛身份	场所
1	崇德八年九月戊申	顾实汗建议清廷请达赖喇嘛至京师为皇太极讽经资福	达赖喇嘛	盛京
2	顺治元年正月己亥	遣使往迎达赖喇嘛	使臣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	藏地
3	顺治三年七月戊戌	使臣察罕喇嘛还，达赖喇嘛、顾实汗遣使同来上表请安	班第达喇嘛、达尔汉喇嘛	京师
4	十月戊寅	贡方物	达赖喇嘛、顾实汗遣使	京师
5	四年正月乙丑	来贡马	喇嘛班第达等	京师
6	二月丙戌	遣使问候达赖喇嘛、班禅胡图克图、巴哈胡图克图、鲁克巴胡图克图、伊尔扎尔胡图克图、萨思夏喇嘛、额尔济东胡图克图、伊思达格隆胡图克图、诺门汗等	使臣为喇嘛侍卫格隆等	各处
7	三月庚午	上表，献方物	达赖喇嘛、班禅胡图克图	京师
8	十一月丁巳	喇布扎尔绰尔济上表	请达赖喇嘛	京师
9	五年正月甲寅	上表献方物，赐宴	唐古特国达赖喇嘛	京师
10	三月乙巳	遣使表贡方物，赐宴	达赖喇嘛、顾实汗	京师

^① 齐光书，第 53-54 页。

^② 以上参加齐光《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第 50-52 页“表三”内容。

11	五月甲申	遣使喇嘛席喇布格隆问候达赖喇嘛，遣书班禅胡图克图	敦请达赖喇嘛，班禅胡图克图劝说之	藏地
12	八月丁酉	达赖喇嘛遣使约定朝见日期壬辰年夏月	达赖喇嘛	京师
13	十一月辛巳	达赖喇嘛遣使朝贡	噶布初西喇布	京师
14	六年七月戊午	遣使献舍利子	达赖喇嘛	京师
15	八年正月乙丑	遣使上表问安	达赖喇嘛班禅胡图克图	京师
16	二月壬寅	赐达赖喇嘛使臣宴于礼部	达赖喇嘛	京师
17	三月乙酉	遣官赏敕谕、礼物往召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藏地
18	乙未	赐达赖喇嘛、顾实汗使臣宴	达赖喇嘛	京师
19	四月丁未	遣使多卜藏古西等赏谕书礼物	往召达赖喇嘛	藏地
20	九年正月	达赖喇嘛表奏来朝日期，顾实汗、班禅劝导达赖喇嘛来朝，表闻	达赖喇嘛	京师
21	二月丁未	遣使往迎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第巴	京师
22	戊午	宴使臣囊素于礼部	达赖喇嘛使臣	京师
23	八月戊辰	达赖喇嘛奏请觐见地方，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谕于边内近地相迓可耳	达赖喇嘛和顺治帝	内地
24	九月庚辰	谕达赖喇嘛于边外代噶相见	达赖喇嘛	京师
25	九月庚寅	达赖喇嘛奏称正兼程前进，至代噶有密奏事	达赖喇嘛	
26	十月丙午	达赖奏言闻顺治帝将于代噶接见，不胜欢忭，兼程而进，更有密语面奏	达赖喇嘛	
27	十月庚戌	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往迎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京师
28	十二月癸丑	达赖喇嘛至，谒顺治帝于南苑	达赖喇嘛	京师
29	十二月壬戌	顾实汗请达赖喇嘛还国	达赖喇嘛	京师
30	十年正月戊寅	于太和殿赐宴	达赖喇嘛	京师
31	甲申	令亲郡王依次宴请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一行	京师
32	戊子	达赖喇嘛以水土不宜请告归	达赖喇嘛	京师
33	二月乙卯	遣达赖喇嘛归，赐宴及礼物	达赖喇嘛	京师
34	丁巳	达赖喇嘛辞归，命硕塞等送至代噶地方	达赖喇嘛	京师
35	四月丁巳	遣官赏送封达赖喇嘛金印、金册于代噶地方	达赖喇嘛	代噶
36	五月乙亥	达赖喇嘛从代噶起程归国，贝子吴达海饯行	达赖喇嘛	代噶
37	六月丙午	达赖喇嘛表谢颁赐印册封号	达赖喇嘛	京师
38	十一年六月庚辰	达赖喇嘛具表谢恩，贡方物	达赖喇嘛	京师
39	九月丁未	遣官问候达赖喇嘛、顾实汗、班禅	达赖喇嘛、班禅	藏地
40	十月壬戌	达赖喇嘛、顾实汗遣使，赐宴	达赖喇嘛	京师

41	十二年十二月乙亥	达赖喇嘛请给其使臣照验印信、及途中驿马供应，班禅谢赐印恩	达赖喇嘛、班禅	
42	十三年二月戊午	赐达赖使臣宴	达赖喇嘛使臣拉穆詹巴	
43	三月丙戌	遣厄木齐喇嘛问候达赖、班禅	达赖、班禅	藏地
44	十二月己丑	遣喇嘛席喇布、萨穆谭格隆赏印	盆挫监控阐化王	藏地
45	壬子	达赖喇嘛、班禅遣使谢恩	达赖、班禅	京师
46	辛酉	赐宴达赖喇嘛使臣	卓礼克图俄穆布	
47	十四年九月癸卯	达赖喇嘛等进贡	达赖喇嘛	
48	十五年十二月乙丑	遣使喇木扎木巴喇嘛、滚布格隆问候	达赖、瓦齐尔汗、班禅	
49	十七年四月壬子	赐鄂齐里汗、达赖、班禅使臣宴	达赖、班禅	
50	六月庚子	遣喇木扎木巴喇嘛问候达赖、班禅	达赖、班禅	

从上表可知，17世纪中，仅在顺治在位的18年间，除了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与顺治帝会面外，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清朝的遣使往来就有五十次之多，而且在这些联系中，拉萨和清廷均显示出积极主动的趋向，充分说明期间二者期望建立政教关系的愿望和以及这种关系对彼此政局的影响。具体而言，喇嘛教对清朝政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二）治边政策中的喇嘛“效应”

满清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喇嘛教对蒙古西藏的影响。从太祖尔哈赤开始礼遇喇嘛教后，皇太极明确把喇嘛教做为“驭藩之具”^①，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喇嘛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蒙古信众视大喇嘛为“天神”，直接影响蒙古人和西藏人的政治文化认同。所以，喇嘛教在清初统治者手里是绝对的政治工具。这一点在17世纪的典型表现是皇太极、顺治父子极力邀请达赖喇嘛朝觐的动机。

如顺治年间邀请达赖进京以及如何接待达赖一行时，以顺治帝为首的清廷，首先考虑的是其对清蒙关系的影响。

顺治九年九月壬申。顺治帝在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时明言：

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两议具奏上曰朕当裁之。

^① 《沈阳县志》卷一三。

对于顺治帝的变卦，达赖喇嘛骑虎难下，原本计划在边外与顺治帝会晤时要“密语”之热情骤减，而进京之后，清廷对于如何接待达赖喇嘛也显得手足无措，是否尊崇喇嘛及在蒙藏事务的处理上听从达赖喇嘛的建言成为争论的焦点，从事后达赖喇嘛短暂停留即要求返回以及朝臣担心达赖喇嘛“含愠而去”，会激起“喀尔喀、厄鲁特必叛”等情来看，此时的清廷之所以加强与西藏喇嘛集团的交往联系，其目的只在治边，只在意达赖喇嘛对蒙古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李宝文认为顺治九年成功册封达赖喇嘛的结果，促成了清朝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青海蒙古的联盟，维护了清初北部与西北边疆的安全。^①

17世纪80年代，康熙帝为解决甘肃边境地区的纠纷，寄信给达赖喇嘛言：

“厄鲁特众领主，皆崇奉尔喇嘛，依喇嘛尔之法度，尊尔之教导。自与朕混一朝政与教法以来，诚信来贡，代代不绝。……故我等一同遣使，兴绝举废，欲使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合于一地居住。如是，方可符合喇嘛慈悲一切，朕使天下太平幸福之至意。若思朕之旨意正确，喇嘛可自彼处遣一喇嘛，与朕此次前去之人约定期日，使其返回。朕自此再遣一大臣，派至约定之地，与喇嘛之使相见而行事。”^②

康熙二十五年，达赖喇嘛的使者罗卜藏与理藩院侍郎拉都虎、温达在龙头山会合，给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指定了牧地。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天阿拉善左右两旗。

（三）对俄关系中的喇嘛身影

在17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俄国与喀尔喀蒙古之间因为边界纠纷问题，关系十分紧张。俄国的勃良斯克总督费·阿·戈洛文以全权大使身份在西伯利亚与清朝谈判之时，也一直试图与喀尔喀蒙古缓和关系。为此，多次派人前去拜访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但是呼图克图都因“礼仪”（即俄使不接受哲布尊丹巴的摸顶赐福仪式）不同，拒绝会见来使。如1687年4月，当戈洛文派遣期助理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携带书信和礼品来见“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时，呼图克图先派人来问瓦西里，“是否准备按照我们蒙古习惯向他——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施礼并接受他的祝福？如果你按照我们蒙古习惯向格根呼图克图施礼并接受他的祝福，他即下令召你携带书信和礼品去见他。”但是，瓦西里回答说，他将按照自己的俄国习惯施礼，不会按照蒙古习惯施礼，也不接受他的祝福。所以格根呼图克图拒绝召见瓦西里。^③

“呼图克图的规矩就是这样的：连从中国来的大人物以及他们各地的台吉前来拜见，也要按照蒙古教规行礼，并接受呼图克图的祝福。”^④

《徐日升日记》记载：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际，喀尔喀蒙古正在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甚至谈判代表遇到大约六七千喀尔喀人希望“投诚”。“率领这些喀尔喀人的是一个喇嘛。喇嘛——如我已曾提过的，是深受喀尔喀人尊崇的圣人”。^⑤

也是在17世纪的后期，俄罗斯极力拉拢喀尔喀蒙古王公和哲布尊丹巴，但是由于达赖喇嘛

^① 李宝文《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考》，《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4册，第317-324页，蒙古文，参见齐光《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第77-78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一册，第221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二册，第450页。

^⑤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四册，第1067页。

及其喇嘛教在外蒙古的影响力，喀尔喀蒙古王公多选择南向的友好政策。尤其是喀尔喀蒙古右翼札萨克图汗部的阿勒坦汗，在喀尔喀三汗部众领主中，与达赖喇嘛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家族领地紧靠南西伯利亚，故而与沙皇俄国多次发生过冲突，也经常互派使者表示友好，但始终没有归顺过俄国沙皇。其实这些都与达赖喇嘛有着密切的关联。”^①

乾隆晚年曾说：“五十余年以来，蒙古臣仆亲如家人父子，致数万里之卫藏及外扎萨克，边远之喀尔喀，悉就约束，遵我轨度。”^②这直接点明了满蒙关系在整个十七世纪维护巩固清王朝中的作用，而能够产生并发挥这个作用的基础是喇嘛教。

（四）对清帝宗教倾向的影响

孔令伟认为，皇太极建立的“大清国”的正统性，有一半来自蒙元遗产和藏传佛教。“清朝立基在藏传佛教普世性上的正统基础，也正是顺治帝于1644年入主中原后立即在蒙古王公的促请下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北京，模仿蒙元时期忽必烈与八思巴建构‘施主/福田’政教模式的主要原因”。^③

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刻意打扮自己对宗教的选择，推动喇嘛教在蒙古西藏的发展，而在满州本地限制喇嘛教，这也是后来一些学者把喇嘛教对蒙古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巨大伤害归咎于满清政府的原因。事实上，清代国家形成与王朝重建中有很鲜明的宗教因素。

清初统治者把自己打扮喇嘛教的保护神，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的前一年，就在赫图阿拉城东修建了著名的“七大庙”，这是新兴满洲政权大兴佛教之开端。1621年，乌斯藏大喇嘛幹禄打儿罕囊素由科尔沁蒙古投奔盛京，为满洲人兴建寺庙、弘扬佛法并扶持建立早期僧团，不久圆寂，由白喇嘛继承他的政教事业。^④综太祖一朝，满洲人的佛教政教事业已初见规模。

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不敌大金，其属下墨尔根喇嘛“载嘛哈噶喇佛像来归”^⑤，此法物乃元朝八思巴所铸，象征着蒙古元裔中政教法统中的“教”的象征归于满洲人之手。随后，清廷致力于延请五世达赖喇嘛，其意在于“不致中断自古帝王所创政教道统延续之事”^⑥，乃知满洲人有明确的政教“法统”观念。顺治年间，五世达赖应邀访京，与清帝并称“东、西方可汗”，合力推行“政体一体”^⑦，清朝大皇帝始获“转轮圣王”^⑧美称，成为清帝宗教化形象登峰造极的开端。

1687年，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至北京，“圣祖深器之”，以之为清朝建立佛教事业、弘法蒙藏的“札萨克喇嘛”。时至18世纪初，康熙帝钦命章嘉“黄教之事，由藏向东，均归尔一人掌

^①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第48-49页。

^② 《清高宗诗文集》卷五一。

^③ 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年第30期。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⑥ 希都日古编译，《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

^⑦ 阿旺洛桑嘉措着，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⑧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187页。

^⑨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⑩ 周叔迦编撰，《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0年，第465页。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24页。

^⑫ 希都日古编译，《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第28页。

^⑬ 希都日古编译，《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第144页。

^⑭ 阿旺洛桑嘉措着，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242页。

管”^①，当时的政教情形如康熙帝所言“合万国以事一人，又从古所无也”^②。终于，清朝拥有了政教体制之内具备最高地位的宗教领袖，可与西藏达赖、班禅教主抗衡。

由于满蒙对藏传佛教的不断接受和满洲政治法统的逐渐成立，满、蒙、藏三方在政教关系的交织中渐成新的“神圣共同体”。早期漠南蒙古诸部归清多有赖于佛教牵引之功，1627年，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引领敖汉部、奈曼部来归，1628年，喀喇沁部以喇嘛四人率众与满洲乞盟^③。漠北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则发挥了聚喀尔喀之众而南归的效应，哲布尊丹巴曾表示：

“南部中国也很强盛，并尊崇佛教，尤以满洲汗的服饰，如同天衣一般，锦缎上绣有龙的花纹，是福分极高的汗王。我等若赴其地，则政权稳定，众生安逸。于是归附满清大汗，兴黄教，得厚遇，享太平。”^④

“满洲皇帝在人民大众的眼中成了佛的化身，好象是佛教的领袖。佛教僧侣封建主、为数众多的寺庙和喇嘛，自然地把满洲皇帝当作了他们信仰的光辉和他们增进祝福的源泉而倾心归附于他了。”^⑤

西藏与和硕特蒙古同清廷共同促成五世达赖与顺治帝的政教会晤，接受清廷敕封，形成今人所谓“以蒙治藏”的政局。总而言之，藏传佛教之于清朝，并非单纯所谓“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性运用，宗教因素是17世纪早期多民族国家中的族群“弥合剂”，为满洲、蒙古与西藏建构了共同的信仰基础。

^①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187页。

^②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③ 周叔迦编撰，《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0年，第465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224页。

^⑤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299—300页。